黃雀行動背后港人舍命救危内情

江迅

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六哥（陈达钲）向亚洲周刊首度完整曝光“黄雀行动”工作日记，整个行动救出了包括赵紫阳儿子赵二军在内的一百三十三名学运领袖、民运分子和学者、作家，期间，黄雀行动有四名成员在公海快艇追逐中丧生；在拯救学者陈子明和王军涛时，行动失败，两名伙计中伏被公安抓获判刑，为此他前往公安部与一局局长谭松裘谈判，发现“爱国”是双方的共同语言，终获释放。

当年“六四”事件中，被称为“黄雀行动”的在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拯救、运送被追捕民运人士的秘密行动，二十年来始终披着神秘面纱。近来，这一面纱虽微微掀起，但深不可测的面目依然没有显露。“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三天，一部“黄雀行动”工作日记首度完整曝光，揭开了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在他杂乱的办公桌上，摊开了二百多页“黄雀行动”工作日记复印件，他边喝着普洱茶边说：“我这是第一次全部公开，再好的朋友也只是看过两三张，前几天只让一家香港传媒拍摄了一张，今天你们亚洲周刊可以随意挑选随意拍摄。”「黄雀行动”中所涉诸多人物至今仍极度敏感，所涉来龙去脉的细节始终没有曝光。

日记的原件，由陈达钲秘藏在朋友家里。眼前的这一页页日记复印件，记载着历史秘密的一丝一缕，记载着当年行动的惊心动魄。陈达钲指着一页又一页如数家珍：“这一页写着‘目前工作进展胜（顺）利’，有二十七个『正』字，一笔划代表成功救出一个人，一个『正』字，意味着救出了五个人。厦门四人，深圳二人，海南二人，广州三人，太平四人，上海五人，福建四人，北京五人……”被救助的名单上有北大诗人、天安门广场宣传部长老木、“六四”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纠察总长”的张伦，还有老鬼、吾尔开希、于硕、项小吉夫妻。他又指着另两页，上写“国安局某某某项目小组处理外逃事件”，“问老蔡，建平在公安接受交代了什么问题，公安提问些什么东西？”“目下尚有几位未有消息，陈卫、陈破空、张雨、李霜……”

在江湖上被称为“六哥”的陈达钲，在八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救出了被北京当局通缉、跟踪、迫害的一百三十三名学运领袖、民运分子和学者、作家。他们感恩地说，他是“香港英雄，中华英雄”（严家其），“丹心一片，高山仰止—永记六哥救命之恩”（苏炜），“六哥救出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功不可没”（陈一谘），“再生父母”、“民运人士大救星”、“当代侠士”、“香港的辛德勒”。长期来，他始终保持低调，避见传媒，十九年来仅接受两三次传媒追访，披露了一些“黄雀行动”的粗略内情。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香港旺角行人专用区举办的“纪念六四，感谢黄雀行动”论坛上，才首次公开亮出自己真实身份。

六月一日，走进香港旺角一幢商业中心大厦，刚步出电梯，通道上香烟烟雾弥漫，循着烟雾越来越浓而走，便是陈达钲的办公室。一见面，个子矮矮的他就豪爽地说：“我的共产主义不是土豆加牛肉，而是普洱茶加香烟。”他一天三包烟，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显得杂沓，他座椅的三面全堆著书报，他挨着的右墙上，悬挂着大陆著名书画家范曾写给他的七字条幅：柯如青铜根如石。当年范曾出走法国，引发“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争议，陈达钲正是范出走

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二十年前的“六四”，热血中华魂。香港人多次百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再次感受港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相连。“六四”开枪后，香港人的激愤转化为一股地下奔腾的力量。被北京当局通缉、追捕的“六四”人士纷纷匿藏而外逃，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被称为“秘密通道”的出逃行动，逐渐形成规模，至少有三百人摆脱公安及国安追踪，成功抵达香港而转移外国。来自草莽的陈达钲，就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六四”事件发生，目睹天安门惨剧，他极度悲伤，削发光头明志，恨不得能与学生们一同抗暴。在“黄雀行动”之前，就成功拯救了一批“六四”人士逃离大陆。一个偶然的机遇，他成了“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屡屡智破追踪，幕幕怒海枪战，演绎了一篇篇隽永传奇。

陈达钲说：“白色恐怖下，民运人士生命危在旦夕，有良知的人都希望自己能伸出援手。看到别人有难，看到弱人被欺负，看到恶人嚣张，自己当然会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不计一己私利，只会勇往直前。这就是中国人的侠气。”

当时大批人逃到广东，但成功出境的还不多。香港演艺圈名人岑建勋是支联会常委，看到成功外逃困难，心里焦急。他听说江湖上有个“六哥”血气方刚，颇讲义气，已经救过一些学生，此人在粤港两地人脉甚广，认识不少江湖人物和走私客。但当时岑建勋不认识“六哥”，于是透过艺人邓光荣，希望能介绍认识“六哥”，一起合作，共同携手采取拯救民运人士的行动。邓光荣的一位朋友叫高世昌。二十年来，这位江湖人物的名字，前些日子首度在传媒曝光。高世昌既认识邓光荣，也认识“六哥”陈达钲。邓光荣由此透过高世昌找到陈达钲，请“六哥”出山。“六四”后，他们四人在香港酒店一间房里，邓光荣、高世昌、陈达钲、岑建勋相聚见面，一拍即合，决定连手。他们四人就是“黄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岑建勋负责联络支联会，支联会参与拯救学生行动的主要是朱耀明牧师和工运领袖刘千石，他们坚持的时间比较长些。二十年后，陈达钲回忆说：“那天在香港酒店见面，我当时一口答应了，此后，我一做就不可收拾了。”

“黄雀行动”是指“六四”事件中，秘密接送外逃人士的行动，最初自称“秘密通道”，整个行动有主要核心，却是松散的组合，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固定人员，随时有人加入，也有人退出。从八九年六月开始，大规模的救助行动集中在八九年下半年，不过零星行动延续直至九七年香港回归前的六月才告一段落。救人过程中，有些相当惊险，就像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境。九一年，岑建勋接受英国一家媒体访问时，突然来了灵感，以“黄雀行动”称之，不久，大家也就这么称呼这一“秘密通道”了。究竟整个行动救助了多少人的准确数字，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回忆，估计有三百来人，据一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当年主要参与者“陈老板”（Tiger）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透露，所有当时的记录和文件，已由香港支联会于香港回归前夕，运送往海外私下保存，以防万一。

当年“黄雀行动”参与者、现任《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日前接受采访时透露，最初大家只是在私底下称之为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秘密通道”,最初是花钱请走私客偷运“六四”人士到香港，救出了一些遭迫害、追捕的学运领袖、民运分子和知识分子，像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主席吾尔开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那时真正的“黄雀行动”尚未开始。运作一段日子，也只是自称“秘密通道”，当时行动私下分散，效率不高，后来众人认为应该将资源集中运用，多救一些学生到香港，最后形成了一个没有正式组织的救援行动。

整个“黄雀行动”没有固定组织，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上下级，早期就是几个核心人物。邓光荣请陈达钲在香港酒店见面，加上高世昌、岑建勋。他们都是核心人物。不过，四人会议决定合作之后，邓光荣基本上就没有直接参与。整个行动主要分为两摊子，一边是支联会

的岑建勋、朱耀明、刘千石和李伟杰，主要负责资料收集、联络、后勤安排等。另一边是直接指挥救人的陈达钲（六哥）、陈达钳（七哥）两兄弟。刘达文说："『黄雀行动』不是个严密的组织，随时有人加入，随时有人退出，比如，像我和罗海星这样，说是『黄雀行动』成员也行，说不是也行，偶然的机会就参与进去了，参与时也没有接受谁的领导。"

陈达钲说："我的代号是李成功。与外逃人士的接头暗号是『我是李成功』。接头时是一张照片的一半，双方各拿出半张照片，两个半张照片若能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这就真的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

赵紫阳儿子赵二军逃亡在海南岛，他是拿着中国护照化名出境的，护照上的名字叫陈学阳。出境时，海关人员发现了护照有疑点，便逐级报告，最终向时任海南省长梁湘打电话请示，说赵二军要出国。梁湘问："他是持什么护照出国的？"回答："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梁湘又问："护照是否有效？"回答："有效。"梁湘说："有效就行了，放行。"

梁湘的儿子与陈达钲稔熟。陈达钲说，由此可见，赵二军成功出走，是梁湘有意放走的。赵二军要来香港，是时任《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与陈达钲联系的，程凯是梁湘的干将。"六四"事件期间，程凯主持的《海南日报》支持学运，支持赵紫阳。赵紫阳下台后，程凯面临的政治压力很大。他下决心要出走，临走前，他去见梁湘，心中默默向梁湘告别，在纸上写了一个字："走"。暗示自己要走了，也暗示梁湘赶快走。梁湘看了纸条，装着狠狠骂了一句："你快给我滚，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示意他赶快走。那年七月，梁湘被中央诱骗去北京谈海南洋浦开发，遭软禁两个月，接受审查，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在六四问题上，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运动，支持赵紫阳；二是洋浦开发计划是"丧权卖国"。结果梁湘海南走马上任，鞍垫未热，便匆匆下台，被撤去省长职务，经年饱受不公正遭遇，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郁郁而终。

陈达钲回忆说，赵二军走了后，他夫人和女儿要走，夫人姓汪，叫什么名，现在忘了。她们始终被有关部门监视、盯梢、跟踪。她们从北京到了广东，与陈达钲弟弟陈达钳接上头。她们从屯门龙虎滩上岸，在去市区途中，遭香港警察例行检查，当时车上有枪。"黄雀行动"过程中，他们有秘密电话，凡是遇到麻烦，就拨打这一电话，号码是岑建勋给他的，陈达钲用大哥大电话拨打了那个号码，是时任香港总督卫奕信接的电话，陈说了情况，卫奕信问陈，身在何处，陈作了回答。不一会儿，警察就接到来自上司的电话，车子没作检查便被放行了。陈达钲说："由此可见，『黄雀行动』与当时的香港政府有密切关系。当时，没有按惯例先将赵二军夫人和女儿送去我办公室，而是直接载她们去了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时总领事是梦飞龙（Jean Pierre Montagne）。"

陈达钲说了赵紫阳智囊陈一谘的故事。陈一谘千辛万苦匿藏在海南岛，躲在一个医生家里，香港支联会把他的资料给了陈达钲，他们就相约他见面。陈达钳和高世昌去接他，将他送到海边，乘坐吞吐量七千吨的大船出逃的，陈一谘藏在大船右舱，很闷热，船长的儿子手持五四式枪，护送他，船驶向广州，到了珠江口，陈达钲派出的"大飞"（在快艇尾部加装四五个马达，一启动便速度奇高）去珠江口接应陈一谘，结果船长的儿子也一起出逃了。到了香港，陈达钲将他俩交给支联会，再送往英国。陈达钲说："当时送去英国的不多，还有四个解放军也是送去英国的。"

广东东莞的四个解放军是"黄雀行动"的支持者，帮助实施计划，比如在虎门过关，他们负责打灯，安全护送外逃的学运领袖。四个军人都是官员，从上尉到少校之间。陈达钲手下人被当局逮捕，四个解放军是参与行动的，见过那手下人，于是担心他们受牵连，陈达钲下令，以最快速度让他们撤离，用快艇接走他们。当时，这四个军人衣服都来不及换，身着军装，背着枪枝，旋即出逃。陈达钲接他们抵达香港，交给支联会，怕夜长梦多，一接来香

港，便实时送上去英国的飞机。

“黄雀行动”中，陈达钲有四个伙计牺牲了，他们是建筑工地的搭棚工人。时年三十三岁的吴浩铭是陈达钲的得力小兄弟，他是粤港一带最大走私犯，走私船队跑遍全世界，手下人强马壮，有几十个马仔，他有一条大船，五六条“大飞”。用陈达钲的话说，此人有“犯罪天才”，政府各个部门，他都有关系，走私关卡全由他疏通。吴浩铭后来因走私及贩毒被中共当局抓捕，判无期徒刑，最近减刑为十九年半，至今还在狱中。他被抓那天是中秋节，陈达钲带着月饼约见他，与他在广州吃饭。当天饭后，陈达钲听闻他被捕，立即赶回香港。

那四个牺牲的伙计就是吴浩铭的手下，两个是大陆人，两个是香港人。快艇高速前进，又有大雾，快艇撞上运载水泥的大船，死了两个。另两个是“大飞”温度太高而着火，他们跳海而亡的。陈达钲说：“我对不起死去的弟兄们。给每个人家属五十万抚恤金，那是我私人给的，与支联会没有关系。我没什么太大能耐，我的工作是靠整个团队，我一个人做不了事，我们讲的是团队精神。”

半年后，即八九年年底，“黄雀行动”受挫。一次在湛江拯救学者陈子明和王军涛时，情报有误，令行动失败，陈达钲的两名弟兄李龙庆、黎沛成中伏被公安抓获。陈达钲为此天天茶饭不思，千方百计救人，他说：“如果要我投降而能救出弟兄，我也心甘情愿。否则，我以后怎么面对那么多弟兄。”被捕的李龙庆，原先是在深圳畔溪酒家当部长，陈达钲认为他能干事，就要他辞去工作，回香港帮忙，上前线去拯救学生。

在香港陈达钲有个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朋友，外号叫“蔡胖子”，他知道陈达钲在“六四”期间救了很多人，无法回大陆，内心很痛苦。蔡胖子有个弟弟蔡晓津，和陈达钲关系很深，由于蔡晓津涉及“六四”问题，陈达钲备了快艇和枪枝，去深圳要他赶快出走，蔡晓津说：“我不走，赵（紫阳）家在位，我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好处，他下台，我也不会受牵连。”由于入境是公安部管辖的事，国家安全部无法安排，于是“蔡胖子”为陈达钲介绍了驻香港的公安部官员彭先生。陈与彭谈判，彭了解了陈达钲不是要与中央对着干，只是为爱国而从人道主义出发拯救学运领袖，陈达钲还明确表示，只要释放他两个手下，他可以不再参与“黄雀行动”。彭先生向北京作了汇报。

不久，陈达钲有了北京之行。有传说他为此北上京城，去见公安部长陶驷驹，他说：“这是误传，我只见过陶驷驹夫人陈芳芳。陈芳芳是公安部一局副局长，是一局局长谭松裘介绍认识的。我去北京见谭，陈芳芳作陪在侧而已。”当年毛泽东钦点华国锋接班，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从湖南到北京，只带了一个人上北京，就是湖南公安厅长谭松裘。原先是要安排他出任公安部长的，后来华国锋下台，他只是出任一局局长、兼外联办主任，陶驷驹早先是谭松裘手下的，谭是陶的“老板”。

陈达钲说：“我的两个小兄弟被判刑四、五年，当时我去北京是见谭松裘。”谭是广东人，第一次见陈就说：“六哥，你来就好了，我们都是爱国的，就有共同语言。”陈说：“你就别叫我六哥了，你年纪比我还大，就叫我小六子吧。”此后，他就叫陈“小六”，公安部里私下都称陈为“小六”了，不过，副局长以下的人当面见到陈，却还是以“六哥”称呼。谭松裘表示：第一，既往不咎；第二，来去自由；第三，在允许的范围内释放他们。半年以后，他们果然兑现承诺，释放了陈达钲的两个小兄弟。陈说：“他没有拿过我一分钱，他特别讲义气。他非常爱国，曾私下对我说，理解我们的行动。为了救出弟兄们，我不能不这么做。事后支联会认为我反共立场不够坚定。他们误解我了。”

零八年，谭松裘去世，陈达钲特别伤心，于是在香港《前哨》杂志刊登了讣告：“您为共和国的安危，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谭松裘先生千古！”讣告署名：“学生：陈达钲、陈达钳、高世昌、杨进荣、陈宝林泣上”。陈达钲说：“谭松裘是中共特务

头子，却在香港的反共政论月刊《前哨》刊登悼念他的讣告。别人知道的话真是笑话了。”

陈达钲说：“一次，我的两个小兄弟被当局抓捕了，我去广州怀集监狱探望他俩。监狱知道我要去，竟然铺红地毯，我是主犯，去探从犯，竟然还享受走红地毯的规格。过了两天，刘达文就随着我一起去，我就把他俩带回香港。”

对于外界说黄雀行动与美国中情局有关，陈达钲强调说：“我这边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一点关系，绝对没有关系。只是在我不再参与『黄雀行动』以后，美国方面派人找过我，问我有什么危险，有危险的话，可以移民美国，我谢绝了，没有接受。”

罗海星被捕以后，“黄雀行动”一度停顿了一两个月，陈达钲还实施了两三次行动，八九年十二月是他最后一次，即那次拯救对话团团长王超华。陈达钲退出行动后，香港支联会人士依然在继续行动。每次行动究竟花费多少？据悉，“黄雀行动”开始阶段，整体形势严峻，拯救规模较大，平均每个成功外逃者需花费五万至十万元，有的甚至更多。陈达钲退出行动，支联会方面继续接手做，此时已没有先前那么大规模，找蛇头只需花数千、数万元便能成功把一个外逃者送往香港。

陈达钲九十年代初在深水酒楼吃饭被人斩杀，江湖传言一度说是中共所为。陈说，那天是在通菜街大金龙酒店，他在外面一桌，与七个朋友一起吃饭，其中四个是香港犯罪集团首脑、是那个绰号叫“大富豪”的张子强案的同犯。里面一桌是黑社会的。席间，另一帮黑社会的人突然冲了进来，向里面那一桌人一阵乱砍。陈达钲见势不妙，又与自己无关，于是赶紧朝外走。谁知门口有这帮黑社会的人把守着，一见有人出来，以为是里面那桌黑社会的同帮，便用刀砍陈达钲头。他鲜血满身，当即被送往医院，他昏睡了七天。陈达钲说：“后来，误杀我的那一帮老大，向我赔礼道歉，我说，不用了。当时，我们就从多方面调查过，这件事纯粹是意外，与政治完全无关。”

他是“黄雀行动”的核心人物，除了那次北上谈判，平常无法返回大陆，他对中国感情依然深厚。他回不去，却特意把家迁移在靠近深圳的上水一幢高层住宅，可以远眺深圳，接收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当年，他偷渡抵达香港，竟朝着大海对岸大哭。

陈达钲说：“人有两条生命，一是政治的生命，一是世俗的生命。当时我认为，偷渡香港似乎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其实，我绝不是叛国，只是当时中国错误路线的背叛者。”

他说，“六四”事件挽救了中共，因为令中共明白什么是革命党，什么是执政党了。改革开放令中国向前发展得很快，共产党不也认同普世价值吗？民主和自由，总有一天会有的。谁要推翻中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今日还有谁能替代中共，中国绝对不能乱，赵紫阳也不希望中共下台。他说：“『六四』肯定会平反，或许要到下一代中共领导人。这是历史伤痕，中央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六月四日夜晚，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处处烛光。香港这一特殊窗口地位，十多年前有那个神秘的“黄雀行动”，今天，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依然在影响着中国大陆，新的“黄雀”不再是飞向境外，而是飞向神州的每一个角落。

黃雀行動日記曝光

怒海枪战　智破国安　救 300 民运人士

没有人掌握行动的全局——不论是北京或是港英政府。六四屠杀后，先后有近 300 名民运人士，透过“黄雀行动”逃到香港。

这行动从 1989 延续到 1997，成员由中方官员、香港商家、学者、记者、电影明星，到走私客、黑社会。“黄雀”在怒海枪战、智破国安追踪，营救过程如电影、如谍战。但许多敏感细节一直不能曝光。本报访寻了多名黄雀，取得当日的救援日记、掌握了行动高层架构，20 年后的今天，在尽量不影响当事人的前提下，拼凑出这段历史的轮廓。

（一）

记者：雷子乐　莫剑弦

多名黄雀异口同声说：“营救行动系个整体工程，绝对唔系某一个人嘅功劳！” 89 年 6 月中旬，大批在逃的学运领袖、知识分子，将身上的香港记者、学者、民间团体、学生会名片，变成“救命符”。许多人接到求助电话，纷纷转介给一批“核心人士”跟进，构成黄雀行动的雏型。

一名黄雀透露，当时掌握整个上层运作的“总设计师”最少有三人，包括朱耀明牧师、艺人岑建勋和一名极低调的港商。“系佢哋决定救边个，边个先救，边个迟救，揾乜人去救，佢哋先系真正总指挥！”当时朱牧跟支联会有默契，“一旦出事，就由朱牧去顶。”“我哋从未做过呢类嘢，有心理准备随时被拉。”

营救最关键、最困难部份，是如何在北京全力缉捕下，找到匿藏的民运人士，再派人北上确认身份，安排他们逃到“安全通道”，等候离开中国。“好多人只系负责一部份工作，好似收到某民运人士消息，我哋知有人识佢，就会叫嗰个人去确认对方身份，逃走又会由另一班人去做。”这“单线”运作，可减少出事风险。

确定资料无误，朱牧等人就拍板。人称“六哥”的陈达钲是最主要的前线营救指挥。《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曾为多名知识分子搭路。他透露，陈达钲、岑建勋及一名“大哥级”影艺界人士，六四后碰头，决定参与，他们分别代表走私客、民运组织及三合会三股势力。

陈达钲策划过 33 次行动，救出约 133 人，包括吾尔开希、黄超华，严家其等。本报取得一份“行动日记”，列出“目前工作进展”“胜利”了 33 次，地点包括厦门、太平、广州、深圳、兰州、上海、北京等地。

偷运孔捷生　大飞枪战浴血

前线营救过程惊险，偷运苏晓康、孔捷生一役发生流血枪战。他们在东莞登上大飞，在虎门遇上两艘边防巡逻艇，被对方发照明弹开冲锋枪扫射。黄雀开枪还击，“舵手”开尽四部引擎终摆脱了边防，在屯门踏石角上岸，但肩部被子弹擦伤。有一次黄雀完成任务折返，在浓雾中撞船，四人死亡。另一次黄雀出海时遇到巡逻艇，枪林弹雨中大飞着火，两名黄雀牺牲。黄雀北上接人时，更用尽假证件、化妆、反侦测等手段，摆脱安全部门。营救秘诀是不坐飞机，少坐火车，多搭长途汽车到广东，以逃避检查。一名女黄雀更善于化妆，将书生肤色变黑、中年变“老饼”。

接头暗号：“我是李成功”

民运人士在茶楼汇合，桌上的烟盒直放，代表有人监视，横放才可以接头。“我是李成功”是双方接头暗号，之后大家会各自拿出半帧相、半张人民币等“信物”合并，确认身份。黄雀每次必准备两部汽车，第一部先出发“扫雷”，第二部留守现场，摸清没有国安跟踪才接走民运人士。住宿点必准备两个，“一个点有人嚟搜，即刻通知另一个点嘅人撤退。”

港商 Tiger 是另一“行动组”负责人，他弃用大飞，主要付钱给渔民，安排民运人士与孕妇等一起偷渡，每个成本约 1 万元。“船家好少睇报纸，除非好出名嗰啲，根本唔知道运紧乜嘢人。”经这线路营救的包括刘刚、熊焱、万润南等人。船家收钱后，会给他们造假身份证、渔民证。另一方法是带民运人士到沙头角中英街参加一日游，然后伺机逃到港界自首。

回顾过去，有黄雀说，当年大家只怀着爱祖国、爱惜学生的情怀，“我哋因为身处呢个时空，遇上呢件事，觉得要出分力，冇谂过荣誉，更加唔会谂安危。”他相信要待六四平反，黄雀行动的一切才可以全面公开。

话你知：原名“秘密通道”

营救民运人士的行动早在 89 年 6 月上旬展开，当初参与者将行动形容为“秘密通道”，直至 91 年 6 月，行动关键人物岑建勋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讲述行动秘辛时灵机一触，妙用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形容他们抢在共产党搜捕前救走民运人士，营救工作才被“正名”为黄雀行动。

求和背后

赴京谈判被指妥协　六哥：我冇出卖任何人

惊心动魄的 1989 年，军队镇压过后，举国陷入秋后算账的白色恐怖。这一年，香港商人陈达钲频频北上，摆脱了国安、公安的天罗地网，在屠夫政权的眼皮下，成功营救出 133 名民运人士。直至年底一次失手，陈达钲的手下被捕，他被迫妥协，赴京谈判。“妥协肯定系下策，关键系我冇出卖过任何人！”

20 年了，他坚信六四肯定会被平反。

陈达钲，人称“六哥”，因在家中排行第六。六哥另一广为人知的称号，就是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系历史选择咗我，黄雀系一个团队嘅功劳，我只负责行动部份，仲有好多幕后功臣。”细节他不愿多谈，“仲未系时候讲，好多人依然在位。”当日北上谈判，他答应过不会高调，不“胡说八道”，多番着记者“唔好写我咁多”。

“共产党原谅咗我”

不过，陈达钲还是首次澄清了一些传闻。“其实我冇见过陶驷驹（时任公安部部长），我见嘅系佢太太陈芳芳。”他透露，当日会面的是公安部一局，即政治局保卫局副局长陈芳芳。

89 年底，他的手下李龙庆、黎沛成到湛江营救陈子明时中伏被擒，被当局视为主犯的陈达钲思前想后，决定北上求和。

“我唔妥协，可以放人咩？”那次北上，对黄雀行动带来打击。陈达钲强调没出卖任何人。他要求来去自如、承诺即时终止行动，希望当局释放他两名“兄弟”。对方的回应是，只要爱国，大家有共同话题。“共产党原谅咗我，?家大家系朋友。”

不过，他依然无法接受军队开枪镇压。六哥自言“眼浅”，六四当日他激动得昏倒入院，出院后，将 7 岁儿子的头剃光以表悲愤。如今读到丁子霖的文章，仍不禁流泪。

65 岁的陈达钲，人生充满传奇。他生于革命圣地江西，9 岁戴红领巾，是共产党忠实信徒。七十年代初，他偷渡来港，在黄大仙的天台小学教珠算、地理，又在钟士元、查济民的

工厂打过工。八十年代初，他经营洋酒、麻雀馆等生意，与走私客熟稔。六四后，他抱着“个人渺小，历史伟大；生命有限，真理永恒”的信念，参与了黄雀行动。

消夜“点错相”遇袭

96 年，陈达钲在通菜街消夜时，被刀手“点错相”袭击，左手和头部连中多刀，入院昏迷七天。六哥说，手术后要戴上纤维头骨，左手手指仍无法活动，记忆混乱，唯一不变是烟瘾。每年六四，若身在香港，他都会隐身烛光群里。他慨叹，六四挽救了中共，民主运动在中国开花，却在东欧结果。

20 年来，中国的经济迈步前进，政制却原地踏步。但他坚信，随着六四的既得利益者渐渐退下政坛，六四终会平反。

险死还生

偷渡途中被迫跳海

“我是柴玲，我还活着！”这段激动人心的录音带，89 年 6 月 10 日在电视播出，6 月 8 日在湖北武汉大学为柴玲录音，并传出声带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蔡崇国，事后也透过黄雀行动安排逃亡。事隔 20 年，流亡法国的他在《我要回家》一书忆述，那次逃亡，一度被船家抛出大海，险死还生。

蔡崇国忆述，他和另一位博士生陈宣良 89 年 8 月逃到深圳，由“六哥”陈达钲的孪生兄弟“七哥”陈达钳安排逃亡。武汉的国安搜捕到深圳，他们及时逃脱。七哥翌日给一位船家 10 万元安排两人偷渡，但因风声紧，行动暂缓。一周后，陈氏兄弟物色到捕蚝船，把两人藏在暗格出海。

趁士兵换班上岸

航程中，十多艘公安船杀到，表示知道两人在船上，要求折返。海水突然退潮，公安船无法靠近，船家迫他们跳海，对他们说：“右方是香港，左方是广州，自己选吧”。他们选择游向较短途的深圳方向。另一边厢，七哥和手下黎沛成、李龙庆急死了，忙到深圳湾海面搜索。

一直指挥营救的人士向本报忆述，当时刚有士兵换班，七哥的手下拿着望远镜侦测没结果，本已放弃行动。临行前他们再拿望远镜一看，发现两个黑点游向岸边，马上落海救人，将两人拖上蚝田。蔡崇国当时被海里的蚝壳严重割伤，全身淌血。所有人登上私家车离去，换班的士兵刚好来到，时间刚刚好，再迟一分钟也会出事。

数簿内幕 营救费达三千万元

黄雀行动有两本“数簿”，包括前线营救费用，以及民运人士在港等候外国政府接收期间的住宿、食用等开支。前者不能曝光，但账目受最少三名核心成员严密监管，与支联会无关；后者部份开支由支联会支付。核心成员估计，整项黄雀行动的总开支约二、三千万元。

部份黄雀行动的资金，来自“民主歌声献中华”。另一部份营救经费则由相关人士四出筹募。

若要把一名民运人士从北方带到香港，约要 30 万元；若从广州偷运到港，收费约为“一个 15 万、两个 25 万”。

按“人头”计，最贵的交易是拯救在天安门发起绝食的学运领袖程真。她当时被船家主动救出，人到香港，“任人开价”。当时两黄雀拿着一袋现金到旺角亚皆老街一间酒楼（小肥羊火锅现址），“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最大额交易则高达 100 万元，一次过偷运近 20 人。

民运人士在港等候外国政治庇护时，支联会曾给予生活津贴。支联会 1990 年的工作报告曾提及“港支联通过各种方法，协助有需要的民运人士前往其他国家生活，负责有关交通、异地接待和安顿。”

马英九捐助学生逃亡

3 个月薪金支援“黄鸟计划”

除经香港，少数民运人士六四后经台湾逃亡海外。当年在广场上负责联络接待进京外地人士的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王龙蒙向本报讲述经台湾逃亡经过时，表示“感谢马（英九）先生”。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他虽没参与当年由国民党海工会执行的“黄鸟计划”，但曾捐款一万美元给计划，这笔钱当时已相当于他三个月的薪水收入。

王龙蒙六四后坐火车去深圳，却在东莞遇上武警查票。就在快要束手被擒之时，另一武警探身上来叫他的同事，来到王龙蒙面前的武警转身离去，才让他逃过一劫。但到了深圳，王龙蒙却发现到处都有北京来的军警，在盘查行人。

台湾渔船营救被装进油箱

走投无路之际，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部负责人张刚找到王龙蒙，两人被编入台湾营救的“旅行团”。化妆后，张刚变成叫“李林”的木材商人，王龙蒙成了叫“黄浩江”的随行秘书。“穿广州越湖南通湖北过江苏，为了装得更像旅行团，我们必须游览许多地方，在南京拜了中山陵，在中山先生的坐像前献了花，心里默念中山先生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到郑州王龙蒙打电话给同学，“我估计北京公安会监听我们的电话，但那时还没有电脑网路，该不会查到我打电话的地址。我说，我已经到了香港……所有有关中央戏剧学院的对话行动，绝食绝水行动及所有的政治责任，都由我来承担。”

他们最后南下杭州，翻山越岭走小路到福建。接头的台湾渔船却遇上事故，他们要躲到山里的农家，一个月后在平潭的小码头，再跟渔船汇合。上船后他们装进油箱，在不足一平方米的空间渐觉呼吸困难。“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里面打开油箱，钻出来打开装着张刚的油箱，把他拖了出来。这时他已经失去知觉，吐的到处都是。”王龙蒙求救，渔民才把他们安排在甲板上。翌日阳光灿烂，王龙蒙只觉：“自由的感觉真好！”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郁琦回应本报时表示，六四时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兼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马英九说，当年由国民党海工会执行营救八九民运人士的“黄鸟计划”，他没有参与计划的执行。但马英九证实，当年曾捐出相当于他三个月薪水的一万元美元给这计划，已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等许多台湾名人，也曾捐钱帮助计划。

马英九昨在就职一周年记者会被问到六四时，只回应一句“非常关注”，称六四 20 周年时会发新闻稿。六四

18 年来马年年著文谴责中共，称“六四不平反，两岸不统一”，前年竞选时仍轰六四屠城“是中共反民主本质的鲜明表现”；但去年当选总统后六四前夕，他发表六四感言突然转轪，不再提平反六四，反而大赞中共在四川大地震中的表现，令外界为之侧目。

（二）

罗孚之子：系一次正义嘅非法活动

民运人士要剥光猪验证

港英高层力劝黄雀核心：别走近海边

“你在那几天示威？”“北京甚么好吃？”民运人士获“黄雀”安排在屯门、黄竹坑等五个“着陆点”上岸后，会立即被遣送往扣留中心，被“剥光猪”搜身，甄别身份。

同一时间，后勤的黄雀会联络港府政治顾问、各国使节、政治人物，争取外国接收。直至 97 年 6 月回归前夕，一切正式落幕。前港英政府视行动为最高机密，曾有一段时间，政府高层力劝黄雀核心：“唔好走近海边。”

记者：雷子乐

“营救民运人士去外国，当时港英政府视为 A 级保密，最高级数。行政局知有呢回事，但唔过问，港督亦唔会讲。”一名前行政局议员透露，这被视为英国行使主权的行动，港督只是执行者。

民运人士的去向极度敏感，当时港督卫奕信派出副政治顾问柏圣文（ Stephen Bradley），直接跟黄雀高层联络。柏圣文 03 至 08 年曾回港任英国驻港总领事。

柏圣文做代表　黄雀解困

黄雀行动组骨干 Tiger 忆述，民运人士当年主要经五条路线偷渡来港，最快是由蛇口经水路到屯门踏石角，在青山发电厂一带登陆，只需半小时；最远是由汕尾经七、八小时水路到黄竹坑。

Tiger 曾在柴湾岸边迎接学运领袖周勇军，遇上便衣探员截查被捕，“喺差馆打足十只指纹”。统筹行动的朱耀明牧师即时致电柏圣文，警方很快放人。

民运人士上岸后，黄雀会立即将他们带到上环水警码头，交给人民入境事务处职员，再送到上水新屋岭扣留中心。“好多人啱啱逃出中国，又见到边境支五星旗，吓餐死。”一入新屋岭，他们即被剥光猪搜查，再接受甄别。约一周左右，就会判定他们是否政治难民，发行街纸。“有个深圳女检察官审查唔合格，要遣返，广州学运名人陈破空都唔得，后来经台湾出走。”

其实，黄雀成员在营救行动前，也参考了一些名单。最早期的名单，来自国际特赦组织，约有近 800 人，工运领袖韩东方、知识分子包遵信榜上有名。另外三份主要名单，分别是 21 名全国通缉学运领袖名单，包括王丹、吾尔开希、柴玲；被点名的 23 名知识分子名单，包括方励之、万润南等人。另一张是六四后“被禁入境 49 名异见人士名单”。据悉是一名热心人士过关时发现，偷偷盗取。他后来也被抓判刑。

据了解，朱耀明最初透过朋友关系，成功游说法国“开绿灯”，一般上午申请，翌日就可上机。英国最保护公安和军人，会即时送走。美国直至 89 年 10 月才开始接收。有军方背景人员逃到香港，因身怀一本密码簿子，美国有兴趣接收。

当有知名民运人士来港，朱牧会同时联络港府、美国国务院及关注人权的参议员。柴玲 1990 年的一个周五到港，美国本答应接收，但法国政府基于“历史使命”直接跟港府“要人”，周日将她送走。大部份民运人士上机前，会到何俊仁律师的办公室宣誓核实身份，再取签证。

黄雀行动往后数年无间断，约在 94 年，民运人士王希哲从屯门上岸寻求庇护，时值中英谈判敏感时刻，但他抵埗即高调约见朋友，令港英感尴尬。政治顾问办公室即时通知黄雀成员降温。

Tiger 忆述，当时惟有“欺骗”王希哲到域多利监狱做行街纸，一日办妥的手续，结果三天才完成，令王在离港前都无法曝光。“佢都怪我，话刚刚放监，又被呃去坐监。”

95 至 96 年，入境处抽调一组特别调查科成员处理有关问题。临近回归，逃亡行动开始收敛，部份人士改由昆明经金三角往泰国，到联合国难民公署寻求庇护。

97 年 5 月底，是黄雀行动另一紧张时刻，当时的政治顾问办公室已迁到中环圣约翰大厦办公。末代港督彭定康答应回归前解决滞港民运人士的去留。已融入香港生活的如韩东方等，5 月获发身份证。 6 月底，最后一批逃亡人士被送到荷兰、挪威等欧洲国家。

回归前夕　行动光荣落幕

六四后，港府政治顾问曾提醒部份黄雀核心别到西环三角码头，别走近海边，不要过澳门。一批曾协助黄雀逃亡的港人，取得了港英政府的安全保障。朱牧师和 Tiger 在回归前夕也一度离开香港，“流亡”美国一段短时间，待情况稳定才回港。黄雀行动光荣落幕。

1〉蛇口往屯门踏石角青山发电厂需时 30 分钟

2〉深圳沙头角往上水需时 30 分钟

3〉深圳南澳镇往西贡*需时 1 小时

4〉惠东港口镇往柴湾、筲箕湾阿公岩需时 5 小时

5〉汕尾往黄竹坑需时 7 至 8 小时

经水路及山路，其余路线俱循水路离开

少校怀冲锋枪逃亡

一批解放军、公安人员曾获黄雀行动协助逃亡。最轰动的一次，最少四名上尉至少校的军官，从广东偷渡到港。由于逃亡过程仓卒，他们抵港时仍身穿军服，身怀冲锋枪、四五手枪等武器！

据了解，当时黄雀行动遇到挫败，有人在内地落网。为防一直协助营救的军官身份曝光，最少四名军官被安排漏夜逃亡。他们未及脱下军服，就携着武器，乘快艇凌晨在屯门龙鼓滩登陆，即时“飞车”到旺角，由另一接头人通知港府。当时，保安司大为紧张，四人即晚被带到机场，24 小时内往英国。港英政府相当重视这类敏感个案，通常一日内安排他们到英国，以免夜长梦多。

滞港生活“营友”准吸烟可饮酒禁拍拖

民运人士不断涌港， 89 年 7 月法国政府认为收容人数接近饱和，但美国还未开始收容工作，香港的“安全屋”有人满之患，位于马料水、西贡等营舍，高峰期滞留逾 50 人。年轻学生在异乡朝夕相对，暗生情愫，黄雀的“营长”为免他们将来或天各一方，曾棒打三对民运鸳鸯，最后只得程真与港人男友莫伟强修成正果。

据了解，安全屋约有十多间，散落中文大学附近的赤泥坪村、西贡泥涌、上水金钱村、元朗锦田等地，其中位于屯门蓝地的安全屋运作至 97 年才结束其历史使命。纪录片《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曾在西贡匡湖居住。沙田富豪花园某单位曾收容变节公安，由保镳把守。

港商 Tiger 除负责前线营救，还当上泥涌营的“营长”，亲自定下营规，酌情让长期写作的民运人士吸烟、每周供应啤酒两次，又安排他们游览海洋公园。

暗里倒垃圾谈情

外国的庇护安排，有时来得很突然，年轻人总依依不舍，差点误了航班。Tiger 笑说，学生领袖项小吉离开时，他安排了啤牌比赛，将营内 20 多人引到大厅，假称“小吉今天煮饭”，

着他到后门，再用绳将行李吊下。

学生朝夕共处，朱牧最担心他们拍拖，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曾三度棒打鸳鸯，但 Tiger 心软，暗地里让一对恋人趁晚上倒垃圾的机会谈情。程真与港人“营长”莫伟强更排除万难，当程被美国收留，莫毅然放弃香港一切，跟她到彼邦生活，现育有一女。

据悉，当时明爱捐出衣服，林钜成、蔡元云医生为民运人士义诊，香港电讯曾送出六部“大哥大”给他们打长途电话。朱耀明忆述，当年白天要安排外国接收民运人士，深宵又要出动安抚他们的情绪，一年半后终于支撑不住，患上肺病。

中伏黄雀

罗孚之子：系一次正义嘅非法活动

罗海星爱国，无悔因“窝藏反革命分子”入狱，“都系判 5 年啫，10 年就话阴功。”六四后，他卷入黄雀行动，为营救民运人士陈子明和王军涛，堕入中共圈套。罗海星等三名港人被捕，同案还有近 70 名内地人受牵连，“好多内地嘅幕后功臣，呢世都可能有人知！”

89 年，罗海星刚辞去贸易发展局驻北京代表、月薪 6 万元的优差，开拓中港生意。“如果冇六四，驻京办主任一早系我！”六四改写他的命运。他出狱后，大商家不敢聘用，他辗转改行做传媒人，到自由亚洲电台工作，近年患病才退下来。

八九学运期间，罗海星身在北京，深受震撼。屠城后，内地朋友找他“搭路”逃亡，事成后再叫他营救陈子明、王军涛。“话佢两个系幕后黑手，好离谱！”他“胆粗粗”再做传讯人，交给岑建勋设法营救。

谁料接头人是“内鬼”，陈、王二人分别在湛江、湖北落网；北上营救的港人黎沛成、李龙庆被扣。 89 年 10 月，罗海星在深圳被捕，一网打尽。“我冇乜办法？接头人系王军涛副手，当时只有信佢！”

判刑 5 年　比王丹重

罗海星出身左派家庭，父亲罗孚曾是共产党员、《新晚报》总编辑。他 16 岁回广州升学，经历文革，曾被指泄露国家机密遭收押。父亲也曾被指做间谍，软禁北京 10 年。罗海星初时被跟踪仍不以为然，“觉得佢哋冇证据，唔怕。”开庭后才醒觉“呢度唔系香港，砌你唔使讲证据！”

呈堂证物，只得一张广州往深圳车票，“无名无姓，就话系我。”

91 年 3 月他被判刑 5 年，比王丹的 4 年还重，“系要警告香港人，好停止营救。”案中多名内地被告，有年轻干部、大学生、教授的子女。罗海星说，营救工作内地无名英雄出力更多，“系一次正义嘅非法活动。”

91 年底，时任英国首相马卓安向中方要求释放罗海星。

92 年他获准保外就医，到英国出席亲人婚宴，马卓安邀他到首相府见面。新华社“打小报告”，他的回乡证即被没收。

05 年，罗海星患白血病，终取回回乡卡。“可能佢哋以为我就死得”。他撑得住，去年重踏京城，看奥运。“北京四周围靓咗，但人嘅质素差咗、贫富悬殊严重咗、官僚越来越劲，好唔舒服。”

罗海星只参加过一次维园烛光集会。他说，是文革条件反射，很怕集会。但他感到“香港人好好，系中国嘅良心。”从前他对平反六四悲观，今天却另一番体会。他说，中国社会近

年矛盾加剧，珠三角工厂倒闭，农民工饭碗不保，“一个政权到咗咁嘅地步，好快会有转变。”

“受害者状态调查”

揭中共迫害六四参与者

由八九学运领袖江棋生撰写的“六四受害者状态民间调查”报告昨公布。这是迄今为止由受害者撰写、对六四受害群体进行综合记录的最完整的报告，揭露了中共对六四参与者残酷迫害的内幕，描述了六四幸存者们悲惨状态。江棋生呼吁所有六四受害者站起来，勇敢向当局讨还公道，只有这样六四才能翻案。

大搜捕制造逾万良心犯

为撰写这个报告，江棋生今年三度被公安抄家传拘，至今仍被禁用电脑。报告详录迄今能收集到数以百计六四遇难者的个人情况，以及六四后当局在全国大搜捕、大清算的恐怖情况，描述六四受害群体过去 20 年经受的煎熬，以及为求正义的艰难抗争。报告特别描述“天安门母亲”过去 10 多年来的抗争过程，指她们已成为六四受害者群体的代表。

报告列举了大搜捕后当局制造了成千上万良心犯的情况，指他们经过短则数月、长达 10 多年囚禁后走出监狱，相当部份生活无着，没有社会保险，其中所谓“六四暴徒”尤甚。报告还列出目前仍在北京监狱关押的 8 位六四良心犯。报告指，六四死难者至少 2,600 人，但迄今只有很少死难者家属公开发声，大部份人在当局迫害下，保持沉默、忍气吞声。

受害者站出来才可翻案

江棋生昨在北京接受本报电话采访表示，鉴于当局封禁，报告汇集资料远不完备，希望借此呼吁更多受害者站出来，重建记忆，只有这样才有公道和正义，六四才可能翻案。

江指，发生在 1947 年的台湾 2.28 事件经过 30 多年后翻案了，1956 年匈牙利民主运动被镇压事件后来也翻案了，“六四不翻案，九泉之下的六四英灵不答应，人类良知、社会公义不答应；天道天理不答应！”现年 60 岁的江棋生六四时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学运领袖之一，大屠杀后一度被判囚。

黃雀行動寫下香港曆史光榮一頁

临近“六四”二十周年，当年营救内地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曝光，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六哥”陈达钲在香港出席公开论坛，并披露黄雀行动的幕后人物有岑建勳、邓光荣、梅艳芳，居间联络的还有高世昌。尽管梅艳芳已逝世，邓光荣否认“参与”，又说“不讲这些事”，但当年付出的勇气与承担，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人士是不会忘记的，历史也必将写下这属于整体香港人的光荣一页。

这也许就是近来被香港几个诬蔑八九民运、刻意为六四屠杀辩护的跳梁小丑所指的“外力介入”了。但这“外力”是什么？陈达钲说没有外国政治势力，没有美国中情局。这外力就是支联会。而支联会是八九民运风起云涌时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组织，当中包括左中右团体。香港数百万市民的热心捐助，是支联会的经费来源；一百五十万市民上街声援民运、抗议屠城，是促成黄雀行动的精神力量；数百万市民每日在电视机前，边看民运进展和镇压惨剧边流泪，这股灵魂的呼应，让有能力参与救援的人士感到义不容辞。“外力”就是数百万香港人，包括新华社、《文汇报》、《大公报》和所有中资机构的人。

根据陈达钲两年前接受海外媒体的谈话，参与和协助救援民运人士的，还有中共党政军各部门不愿执行大逮捕、大清洗的有良心的人。孔捷生前天的文章透露，载着他的高速快艇

上，有六七名中国现役军人或武警。陈润芝在《六四二〇》一书中，引述“六哥”的话，说他的弟弟“七哥”偷运民运人士时，公路上遇到军人查车，把车门打开看到满车都是戴眼镜的年轻人，“七哥”正担心“这次玩完”时，怎知军人说：“没事了，走吧。”

这些“外力”为甚么要“介入”？因为萤幕所见，军队杀人已近疯狂。逃亡的知识分子严家祺说：“从 89 年 6 月 4 日早上开始，5 日和 6 日那几天，中国情况混乱，政府抓到和民主运动有关的人，就要杀掉。政府狂捕滥杀，有人当时被就地处决。我们都怕被抓，不逃不行。”因此，当一个个民运人士被传出已脱难时，香港人在泪流满面的压抑中，也算舒了一口气。黄雀行动担负着香港数百万市民的期望，所做的不仅是拯救了一批人，对香港人也是一次心灵救赎。黄雀行动体现了整体香港人的意志。整体香港人不是曾特首嘴里的见利忘义之徒。

八九民运中，学生领袖“有错”吗？有“不负责任”吗？纵使有，也不是问题的焦点。手无寸铁的学生再错，也不是用坦克机枪去捕杀他们的理由。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今年二月到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在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面前，谴责了以色列对迦萨的军事行动，演辞中最动人话语是：“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牆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无论高牆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

高牆，是掌握一切暴力机器的权力体制，鸡蛋，就是被他们压碎、射杀的平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牆。体制理应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以卵击石，无论怎麼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黄雀行动，是当年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的“灵魂彼此融合，所产生的温暖”。村上春树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是。”

当然，有的人投靠体制，已放弃自己独立的灵魂。但这些人至少可以选择沉默吧，何必扭曲自己良知，将所有的受害者再杀害一次呢？